

从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 看我国的两个经济问题

谭 崇 台

一、必须正确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必须正确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指生产的增长,或产出的增长。用统计学术语说,经济增长指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国民收入的增长。

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 投入结构的变化,即生产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是否从手工劳动转向机械化操作,是否从粗放劳动转而使用熟练劳动,是否从土著生产方法转而采用先进技术,或者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当然,这是就一般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的,在劳动力十分充裕的国家,在努力推进机械化生产、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即在生产中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逐步代替劳动密集的同时,又可以在一些产业中继续保持甚至深化劳动密集的生产。

2. 产出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否在产业比重上,农业部门相对地缩小,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相对地扩大的同时又比服务业部门相对地缩小,服务业部门则逐步地扩大,或者这种变化很小;是否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初级产品业与加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以及基础产业与非基础产业的比例趋于合理,或者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而越畸轻畸重。

3. 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的变化一般表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人均的营养条件(如每日摄入热量)以及人均的居住条件(如每人所占的住房面积)的改善等等,但只是人均指标并不能确切表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或下降,还必须考察分配状况,如尽管人均国民收入明显提高,但收入分配的状况却日趋不公,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则一般的生活水平并无实质性的提高。

4. 健康卫生状况的变化,表现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和病床数等,当然,在观察这些指标时,要注意到地区等方面的差异。

5. 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表现在适龄青少年,特别是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等。当然,在观察这些指标时也应当注意地区上的差异。

6. 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变化,是否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状况日益改善或日益恶化。

可以设想,衡量经济发展比衡量经济增长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国外已有不少经济学

家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并提出了几种可供选用的指标体系，其中，“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就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提出的“社会指标”体系^①，借鉴了国外的分析方法，结合了我国的国情，具有较高的统计价值。“社会指标”体系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四个部分组成，具体分解为16项指标：（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4）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6）非农业人口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7）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上2—7项为社会结构）；（8）中学生占12—17岁年龄人口的比重；（9）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的比重；（10）人口自然增长率；（11）平均预期寿命；（12）婴儿死亡率（以上8—12项为人口素质）；（13）平均多少人有1名医生；（14）平均每人每日摄取热量；（15）通货膨胀率；（16）人均能源消费量（以上13—16项为生活质量）。

由上可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互有联系而又互有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内涵较狭，经济发展内涵较广；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又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

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如果出现有经济发展而无经济增长的现象，那一定是个别的、短暂的、反常的现象，而决不是一般的、长期的、正常的现象。据统计，古巴在1960年——1970年阶段和1970年——1975年阶段。实际经济增长率各为0.6%和1%，但自1959年起，古巴的收入不均程度逐渐减小，教育比过去普及，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有普遍的改善，绝大多数群众的健康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然而，必须指出，这是由于社会经济急剧变革所带来的结果，一个国家不可能在负增长或微弱增长的基础上长期地把发展维持下去，更不可能在负增长或微弱增长的基础上把发展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事实上，从80年代起，古巴的经济增长已在加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经济发展，在下述几种情况下，就会是如此：

1. 经济增长了，但经济效益的提高缓慢，甚至下降。

2. 生产增长了，但实际上是经济上的虚耗。产值增加，但产品质量低劣，甚至出现大量的废品次品，不为消费者所接受，或者产品即使具有一定质量，但缺少需求，不能实现其价值。

3. 生产在某些方面的增长，从微观、局部、短期看似有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但从宏观、全局、长期看却带来不好的、甚至很不好的社会效果，如有害人民健康、污染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

4. 增长虽快，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城乡对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日益激化。

5. 为了追求高增长速度，不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不计社会代价，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造成经济倒退。

上述情况的出现，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因此，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启动经济增长，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但是，如果政策失误，或机制上存在缺陷，则完全有可能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决不能认为，只要有经济增长，只要有经济建设，只要有大规模投资，生产结构就会自然而然地趋于合理，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既走向现代化又适合本国国情，广大人民的福利自然而然

地逐步上升，分配状况自然而然地走向公平，文化教育和健康卫生条件自然而然地日益改善，自然环境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保护，生态平衡自然而然地得到维持。

总之，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考虑它在经济发展上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实现。决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不要只着眼于它本身的经济效益，而要关注它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对每项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估，作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分析和论证。对一切经济工作的考察都应当把视角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

单独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往往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利益，而忽视的往往是全局的，长期的害处，从而不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是全局的、长期的利害得失，从而有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

二、从经济发展观点看我国两个经济问题

（一）、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启动机，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有一定速度的增长。

根据国外统计，包括孟加拉、缅甸等国在内的197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50美元以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至1975年阶段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8%，其中最高的是坦桑尼亚，达6.8%，最低的是孟加拉，仅2.4%；包括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在内的197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50美元至325美元之间的10个发展中国家在同一阶段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5%，其中最高的是象牙海岸，达7.7%，最低的是塞内加尔，仅1.2%；包括南朝鲜、智利等国在内的197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25美元至1500美元之间的16个发展中国家在同一阶段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4%，其中最高的是南朝鲜，达9.3%，最低的是智利，仅2.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我国在1960年至1975年阶段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5.8%，如果从1953年起一直计算到1986年，年平均增长为8.9%，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年增长率6%左右为中速，年增长率4%以下为低速，年增长率8%以上为高速。我国34年的平均增长率达8.9%，属于高速增长，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效果，主要表现在：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工业化基本上奠定了基础；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农业生产的进步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预期寿命1987年为69岁，人均每日卡路里供应量1986年为2630，出生时重量不足的婴儿的百分比1985年仅为6%，婴儿死亡率1987年为32%。这些良好情况是其他低收入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按照前面介绍的“社会指标”体系，对1987年120个国家和地区16项社会指标综合评估结果，世界平均分为76分，我国为68分，居世界第70位。这一水平，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51分的33%，低于48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78分的13%，因此，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总水平大致相当于中等偏下水平。如果按指标体系4个组成部分去观察，尽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102位，但社会结构指标居世界第96位，人口素质指标居世界第57位，生活质量指标居世界第43位。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对比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工业凋敝，农业衰微，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悲惨情况，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说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国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又存在着必须引起重视或必须引为教训的问题：

1. 经济增长不是持续稳定的,而有很大的波动起伏,后一年的增长率与头一年的增长率相比,往往相差8到10个百分点,有的年份差距更大,如1958年和1959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32.6%和18%,而1961年和1962年骤然下降为-33.5%和-10%,1965年和196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9%和16.9%,而1967年和1968年骤降为-9.9%和-4.7%。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式,32.6%的增长率意味着积累率已至少在90%以上,这样的高积累率必然使国民收入的消费部分被强制压低到人们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使经济生活脱离正常轨道,最终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并导致负增长。经济增长这种大张大收、大上大下给国民经济的损害是破坏性的,我国1960年后的3年经济困难,就是极大的教训。如果高增长率来自信用膨胀的支持,必然直接带来需求过旺,在缺乏相应的有效供给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1983年后连续三年的高增长率造成的恶果,又是一大教训。

2. 高速的增长并未得到相应的、合理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农业、交通运输和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发展不成比例。如农业与手工业产值增长率的正常比例,应为1:2.5。而1986年至1988年三年中两种产业平均增长率的比例为1:3.3,铁路货运量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合理比例,应为0.5:1,而1986年至1988年三年中两者平均增长率的比例为0.35:1,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六五”期间为0.61,而1986年至1988年期间降为0.40,尽管我国钢铁工业扩大较快,1986年至1988年三年累计进口钢材仍达4千万吨之多。②产业结构不平衡已成为协调、稳定发展的重大障碍。其次,表现在经济效益不高。从不少材料可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比较缓慢,百元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逐渐增长,定额流动资金周转次数有所增加。经济效益不高,在从去年起延续到今天的“市场疲软”情况下,更集中显露出来。销售不畅,库存增加,税利减少,这固然是由于控制总需求引起的一种结果,但也反映了因管理不善和产业结构失衡而造成生产低效率运行和产品不适销对路。第三,表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还不很理想,在1978年以前,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只保持糊口水平。一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更一直未得到基本的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比建国初期反而恶化。近几年来,分配不公现象也在露头。第四,耕地减少,江河污染,森林破坏,水源枯竭,土地沙化等等环境与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虽然日益严重,但在1978年以前,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注意和及时的解决。而且我国一些产业的发展没有从广大人民卫生健康作出长远的考虑。例如,我国的卷烟工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最近公布的1989年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名单中,卷烟厂达58家之多。诚然,卷烟工业无论从微观上或宏观上都有很大的近期经济效益,在100名利税大户中,卷烟厂有40家,利税额最低2亿元,最高10亿元,但是据估计由于吸烟我国每年有10万人死于肺癌等疾病,而且30年后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为200万,这一严重情况的存在,是有悖于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也是不利于我国社会目标的完美实现的。

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制约了积累率的合理界限,从而以高积累率促进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是有所限度的。但是,在传统的模式之下,却不存在着自动约束投资、遏制投资的经济机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增长速度上成为人们一种简单的认识,似乎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的经济扩张冲动,在建国以来40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1958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历历犹在目前,1977年和1978年的“洋跃进”使国计民生再度紧张的教训,记忆犹新,而1983年和1984年新的跃进思想又抬起头来,加上对某些西方经济理论

的误识和误用，人为地过度扩大了总需求，终于造成了1988年经济的震荡。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会给国民经济带来莫大损害，对我国来说，确是一个应当永志不忘的教训。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认为，我国把经济增长的目标定为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是正确可行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7%，是中等略高的速度，照资本——产出比例估算，积累率约为26%，两个数字都是比较合理的。实际的情况是，198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长了1.2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9.38%，因此，到2000年，只要每年保持5.5%的增长率，就可以较顺利地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但是，在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的效果，一定要全面考虑，执行正确而可行的发展战略。

基于上述分析，我也认为，治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经过了很大的努力，治理整顿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使1984年以后的几年中决策的某些失误导致的宏观失控、总需求过旺、通货膨胀开始向恶性转化等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产业结构调整还很缓慢，经济效益还无好转，治理整顿的6条目标尚未实现，而导致经济过热和追求高速度增长的客观的体制根源与主观上的思想根源还没有真正得到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继续治理整顿，必须深化改革，但在整个过程中，不能淡化经济发展观点，不能模糊经济发展目标，而且必须认识：经济稳定是首要的，经济稳定是经济转向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二）、乡镇企业发展问题

用经济发展观点观察乡镇企业，可以得到较全面的认识，一方面看到乡镇企业的优点和作用，另一方面又看到乡镇企业现存的缺点和弊端。从而得出恰当的产业政策。

11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并飞快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它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庞大人口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粗略地估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人，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农业十分落后的原因之一。因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出路是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据概算，把1个劳动力安排到工业中去需国家投资2万多元，把2亿劳动力安排到工业中去需国家投资4万多亿元，这是国家财力根本不可能负担的。如果对这样庞大数量的闲置人口任其盲目自由流动，则冲向城市的结果必将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想贮水池，它接近农村，可以使劳动者离土不离乡，就业不进城。事实上，经过10年的努力，1989年乡镇企业已吸收了9.000万人就业。

其次，乡镇企业可以成为城市工业的补充和城市工业配套生产，如加工后者所需要的零配件甚至一些中间产品，当城市工业技术更新、转向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生产时，乡镇企业可以接替城市工业原有生产技术进行较低层次的生产；乡镇企业从地理上说比较接近初级产品的基地，取材方便，而且规模小。集体所有或个体所有在管理上比较灵活，易于根据市场信息而变更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花色，起着城市大企业所不能起的作用。

再次，乡镇企业已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条重要支柱，在经济紧缩的1989年，乡镇企业产值达7500多亿元，相当于1979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工业产值达5100多亿元，相当于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占198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乡镇企业在同年中还为国家创收外汇100多亿美元，约占全国外汇收入的20%，1979年——1989年乡镇企业为国家交纳税金1504.9亿元。

最后，乡镇企业可以帮助农业的发展，起着以工补农的作用。农业面临着水资源不足，土地老化，化肥短缺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国家财政是难以全部

承担的。乡镇企业的收益除了扩大和更新自身的生产外，还可以就近支援农业，1978年——1988年累计，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共达3828亿元，占同期农民净收入的25%，1989年达到1054.9亿元，已占农民净收入的33.7%以上。同时乡镇企业还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改善提供了大量资金。1979年——1989年乡镇企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达到233.4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农业投资的35.45%。1979年——1989年为改善农民文化生活、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提供发展基金8.4亿元。

总之，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壮大，为支援农业、解决就业、繁荣经济、增加收入、充实国库和创收外汇作出了巨大贡献。乡镇企业的快速增长，发生了很好的发展效果，这必须充分予以肯定。

但是，从经济发展观点看，又可以看出飞快增长的乡镇企业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在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方面造成的不好结果。城市工业往往把污染较重的落后生产技术向乡镇企业转移，而乡镇距离城市较远、环境保护机构往往鞭长莫及。缺少必要的监督与检查，形成一种“污染转嫁”的状况，一些乡镇企业还占用耕地，破坏山林植被。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乡镇企业应当在这方面看到自己的消极作用。

其次，不少乡镇企业技术比较落后，经营管理不善，生产中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系数过大，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少数乡镇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甚至不惜破坏国家资源。

还有，在国家计划无法有效约束，而正常的市场作用尚未能发挥的条件下，一些乡镇企业与城市、国营工业争原料，争市场，争交通运输，出现了“羊毛大战”。“蚕茧大战”、“棉花大战”、“烟叶大战”等反常的经济现象，除了人为地扭曲市场价格外，还使先进的国营工业因缺少优质原料而不能生产优质产品，而落后的乡镇企业又无法有效利用优质原料生产优质产品，宏观上使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

从上述的两面观察，可以得到对作为新生事物的乡镇企业的比较全面的认识。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毕竟还不太长，还有一个逐步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国家宏观发展和产业政策要求的过程，国家各主管部门也有一个相应的了解、熟悉和适应、以便更好地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各项调控政策和措施的配套与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要认真“按照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调整”指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产业政策，保持适当增长速度，进行结构调整；“整顿”指强化企业管理。改善企业经营；“改造”指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租赁、兼并、股份合作等各项改革措施，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指全面提高企业素质，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可以设想，这一“八字方针”的贯彻，将保证并促进快速增长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效果。是符合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的。

注释：

① 见朱庆芳：《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到底居世界多少位——谈一种按社会指标综合评估的国际比较》，《人民日报》1990年7月9日。

② 参见《经济研究》1990年第7期、第6页。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